



阙本旭 陈俊华◎主编

汕头大学



潮学研究文萃
〔下卷〕

汕头大学潮学研究资料丛书



SHANTOUDAXUE
CHAOXUEYANJIJWENCUI

汕头大学出版社

潮

汕头大学潮学研究资料丛书



汕头大学 潮学研究文萃 〔下卷〕



阙本旭 陈俊华◎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SHANTOUDAXUE
CHAOXUEYANJIUWENCUI

K296. 53-53
QBX
V.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汕头大学潮学研究文萃 / 阙本旭, 陈俊华主编.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81036-997-0

I. 汕… II. ①阙…②陈… III. 文化史—研究—汕头市 IV. 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6000号

汕头大学潮学研究文萃

主 编: 阙本旭 陈俊华

责任编辑: 廖醒梦 李资渝

责任校对: 蒋惠敏

封面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刷: 广州东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5.75

字 数: 580千字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18.00元(上、下卷)

ISBN 7-81036-997-0/K·70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3004室
邮编 510620

电话 / 020-22232999 传真 / 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 / 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3833 传真 / 603-9056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编 委 会

顾 问：刘诒恢 杨明华

主 编：阙本旭 陈俊华

副主编：刘晓莉 马晓晖 金文坚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景熙 陈俊华 高晓军 金文坚 刘晓莉

马晓晖 阙本旭 宋 钢 翁桂南 翟保改

论郭之奇其人其诗*

吴二持 张惠民

郭之奇（1607—1662），字仲常，号菽子，一号正夫，又号玉溪。广东揭阳人。幼聪颖，年十一充邑庠生，清才骏发，越其侪辈。年二十二登崇祯戊辰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越明年，请假归省，期间县令冯元飏请修邑志。癸酉（1633）假满入都，改礼部主客司主事，提督四译馆，奉使册封荆藩。明年转本司员外郎。越年（1636）主试河南。事毕转郎中，以内艰归服。服除补原职。辛巳（1641）升福建提督学政、布政使司左参议，兼按察司僉事。于福建视学四载，孜孜罔怠，力振文风，兴奋士气，严绝竿牍，以杜蹊径，虽权要弗避。后转副使，寻摄按察司事，力抑豪强、平冤狱。

郭之奇不仅文才出众，亦能治武统兵，曾摄兵备事，期间有尤溪贼劫掠闽清、永福，郭之奇督兵星夜前往，旋奏功，并与地方官合力剿搜，绝其后患。尤溪贼刚平，而江西袁吉诸郡告陷，益藩邕宁王亡国走闽，贼势长驱，闽省振动，之奇至邵武谒益王，请归国。王不决，之奇乃请于抚军，提师扼杉关，据险设防，建南赖以安。后因诸大臣力举，擢太仆寺少卿。甲申京师陷，崇祯帝崩于煤山，抚按欲援恒例，待哀诏至才发丧，之奇力争，率闽士缟素哭临，因而触忤抚按。后升詹事府

* 本文原载于《潮学研究》第6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詹事。^[1]清顺治二年（1645）七月，唐王即位于福州，号隆武，时南安伯郑芝龙等有拥立功，挟嫌力挤，郭之奇遭谗落职。稍后赖朝中诸大臣连章昭雪，恢复原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暂时家居。期间两次捐家产数千两以助军饷。^[2]越年春，上“为恢复先审定略疏”，对南明小朝廷所处地理形势及其政治、军事地位的分析极具识见，可惜新主心向偏安，未能果断采纳其战略选择，结果只隔半年，清兵越仙霞岭，关门却无守兵，长驱直进，帝遂陷。未几，九军贼陷揭阳，之奇之弟死难，之奇与其父均被执，幸普宁故人在籍御史林铭球设法救脱，依林家，以图起义恢复，未果而父艰，铭球亦卒。后九军贼败散，始回揭阳。丁亥（1647）汀州之变，唐王陷，桂王即位于梧州，越明年，奔肇庆，之奇因父艰未即从行，曾上疏述其苦衷。

时有孙可望者，乃张献忠之义子，收拾献忠残兵余卒十余入贵州，屡遣使往桂王处邀封秦王，桂王诸大臣力加谏阻，之奇亦上疏言其非法。孙可望恼羞成怒，假称护驾，发兵至南宁，杀阻封诸大臣，挟桂王入贵，时之奇正趋召途中，帝恐其为孙可望所害，乃密旨让其居外。并拜东阁大学士。同年七月，特敕督师闽粤，兼制江浙等处恢剿军务，监催勋镇官义兵马，综理粮饷，赐上方剑便宜行事，太子少保，礼、兵尚书，东阁大学士。之奇遥领科命，往来于防城、啼鸡山、钦州龙门、牙山等地，或坚固城防，或领兵收复失地，往来奔波，为故主支持残局。期间曾舟行，于牙山遇飓风，自身侥幸获免，而三妾一女一侄女均遇难。后帝展转入滇，恩授郭之奇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己亥（1659）清兵入滇，永历被迫不断跋涉，五月缅甸王迎帝，羁帝于孟坑城处，郭之奇追随就近盘恒于南文文渊州一带，转徙无定，跋涉艰难，“前后十一年间，或潜穷谷，或

入荒山，结茅筑土，雨宿风餐，甚至粮食不继，犯风涛瘴氛虎狼之险者数矣。”^[3]然矢志不改，毫无怨言。曾得家书劝其归休，之奇毅然复书曰：“予以藐躬为纲常谋，虽有家，义不得顾。非不念子弟侄，而怒焉兴怀，瞻故国，眺邱垄，而怆然以悲也。光复则扫垄有日，陆沉则望乡无期。儿继吾志，葬吾祖、吾父，传吾文，予蔑复有言矣。”^[4]期间作《稽古篇》五十五卷。辛丑（1661）年八月四日，与光泽王俨铁、总兵杨祥，同为交人所诱执，以献于两广之使，越年八月不屈被杀。自被执以至羁解途中，多有诗作，咏山川景物，记事抒怀，寄托其眷君、忧国、忧世、伤民之思，及视死如归之志节。同僚学士黄道周叙郭氏文集曾云：“正夫既以学宪治建中，士益好古，绣补龙骨，烂然比屋之下。会鱼梁盗起，正夫手握两印，朝辞浦城，暮歼其渠首而归。江右诸郡，又方怵于风鹤，藩府仓皇，利用迁国。正夫身佐抚军，提一旅西扼杉关，七建之土，用有底定。……如正夫者，所谓备体用，适于通变者也。今世摧颓，人才愈下，文吏不武，坐为宵旰所轻。诚得如正夫三五辈，张维振纲，天下廓然，何必诵兼葭而愁苍霜乎？”^[5]

有关郭之奇生平事迹，明史无传，仅散见于朱天麟传中，同时人又是同乡人的罗万杰撰有“墓志铭”。乾隆时的《胜朝殉节录》也略记其事迹，府县志及后之《广东通志》均有简传，内容相近。道光间顺德冯奉初编《潮州耆旧集》，又更为立传，稍详；光绪间修的《揭阳县续志》，则补前传之不足，对后半生叙述稍详，然仍只吉光片羽。饶宗颐先生曾作《郭之奇年谱》，搜罗较广，考辨颇详。

郭氏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一生秉直节，为官清正，不畏权贵。其思想受传统文化浸润极深厚，忠君意识极浓烈。个体颇向往传统出世的隐士，而走的是安邦治国的入世正途。以传统士大夫标准衡量，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均沾，且均有



成就。特别是维持明季残局，多有贡献，最后为臣死节，视死如归。实现其完善人格。

郭氏立身处世所持，人生行迹所历，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宗，为基本取向。对于传统文化，他不仅师法孔孟，也熟稔老庄，对历代隐逸之高士，尤有独特的体悟认同。于仕途顺境，能从容治事，忠君爱国，一往无前，任劳任怨，不自居功与骄矜；于未仕或非顺境，如丁艰或仕途曲折、落职家居、蛰居深山之时，则颇具高士之风度，能自适其适，显出其处世态度之超然，其文化底蕴之厚积。

尽管郭氏个体有点向往隐逸之高士，然而他毕竟是走了入世的正途。作为传统士大夫，他具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才华，其忠君思想加上清廉直节的性格，使他无论在吏治上或军事上，均兢兢业业，政绩突出。居于明季乱离之世，苦撑局面，试图做光复中兴之大业。

郭氏颇认同于古之夷齐、柳下惠，追求行一己之至人之风，追求道德人格之自我完善，认为“可以起百年之忠义，可以忘千载之怨尤，可以壮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烈肠，可以破枉尺直寻患得患失之锢志。嗟嗟！顽廉儒立，鄙敦薄宽”，可使人师其风而“不降不辱不怨不憚”，诚“圣人百世之师也”。这种思想，可谓是郭氏一生为官所效法的基本准则。他晚年跟随永历帝跋涉于粤桂南交的一切，就是这种认识的实践。当其被交人所执，知不能脱，他反有一种解脱轻松的感觉，试看他当日所作的两首《记事诗》：

十载艰虞为主恩，居夷避世两堪论。一时平地氛尘满，几叠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秋风洒泪痕。

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几自鞭。血比苕弘新化碧，魂依望帝合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

照简篇。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

虽有哀思而意甚超然。当被羁于桂林之城隍庙，诸当事问有“何愿”？他应曰“余何愿哉！余登籍三十四年，身为大臣，尺寸未立，生有余愧，死有余责，流放诛殛，引颈以俟，早一日则一日之赐也，余何愿哉。”^[6]依常情看，无论前后期，郭氏对君主可谓忠心耿耿，并无亏心，也几无失误，然他似仍有愧悔自责，感叹“曾无尺寸酬高厚”，感叹“身为大臣，尺寸未立，生有余愧，死有余责”。并且“引颈以俟”死，认为“到头苦节今方尽”，不仅视死如归，且以能“成仁取义”为荣，为人格完善之通途。可见其追随认同古之“至人”，以求道德完善思想之贯于始终也。

历史地来看郭之奇其人，他无疑是潮汕这块文化沃土成长出来的文天祥式的人物，其名位、志节、经历所表现出来的完美丰满卓绝千古的文化人格，与文天祥可谓是后先辉映，诚为潮人文化之骄傲。可惜其生前历尽磨难而死后一片丹心未能光照于汗青，寂寞身后事，端赖后来人为之表彰。

对文天祥、郭之奇这类人物进行历史评价，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蒙元与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性如何评价的问题，涉及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摩擦斗争和交融整合的重大课题，以及诸如爱国主义的问题等。讨论这些问题并非本文的目的，因此我们只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政治民族斗争问题，而从文化的意义上来加以审视。中国历史上胡汉之争斗、夷夏之更替，实际上并不具备近代意义的国与国的政治斗争，而只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军事的斗争，乃至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顾炎武于明清之际的大变局中于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



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7]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的来历。梁漱溟指出顾炎武完全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他所说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指出的“匹夫有责”的天下，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种族，却只是一种文化，是指落后民族的落后文化对先进的华夏文化的一种摧残。所以中国历来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以文化为标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取舍。^[8]因此，文天祥、郭之奇于宋、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于南宋、南明小朝廷主客观上均无可作为之时，政治上苦撑时局，其意义和价值都无可过分称道之处，充其量只是作为“肉食者”的“保国”而已。实际上，南宋、明季之衰败，其主要原因是在其统治者自身，因而几乎是无可能保住的。但如果从文化的意义看，蒙元、满清挟著塞外杀掠之气，以游牧民族的野蛮的铁蹄践踏蹂躏华夏灿烂文明之时，文天祥、郭之奇辈作为一面文化旗帜，为华夏文化守其节操，其意义就不同凡响了。他们的经历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就为中华文化史写下浓重光辉的一页。而他们作为个体的人格风范，其担当精神，其弘毅人格，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内在精神，在完全绝望之中抗拒绝望的悲壮与苍凉，就同大多数的“聪明人”的识时务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坦然赴难从容就义的傻子精神，就使千百年之后的聪明人的得意显得底气不足。鲁迅最赞赏那些竞技场上明知获胜无望而奋然跑完全程的运动员和那些肃然而不笑的观众。所以，当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处审察历尽艰辛而面有菜色，在荒郊野岭之中为一个毫无作为毫无希望的南明小朝廷而苦撑苦捱的郭之奇时，我们不能不为之肃然。

二

郭氏年十五始学声律，曾自谓当时是“呼夏虫而语冰，执井蛙而问海，必也为他日羞”，于是“诗成辄弃”。从十五至二十二岁中进士之间七年，“读书中秘”，与诸友同馆，则“花砖马背，连裙振辔，扬挖风雅，思不懈而至于古”。^[9]于是，自此时始，无论治文治武、家居旅次、马上舟中、赋闲倥偬，均不断有诗作，其诗作在潮汕历代著作家中，称谓最富。据其于辛丑（1661）自编定之《宛在堂诗集·自序》中称，早岁之诗“一再削稿，三存之一”，所收“凡十八集，诗二千八百四十首。”^[10]加上尔后一年多之诗作（从被执到殉节就有诗作二百七十五首），共有三千余首。此外，《潮州耆旧集》所收文，尚有《怒流草》、《初瞻集》的自叙各一篇，自注分别作于戊辰（1628）和己巳（1629），可见尚有未编入“宛在堂”的两个集子，即所谓“一再削稿”部分吧。“宛在堂诗集”十八集创作的大体时间如下：

1627—1630 年（21—24 岁），作《马上》集；

1631 年（25 岁），作《舟中》；

1632 年（26 岁），作《遂初》；

1633—1636 年（27—30 岁），作《感遇》、《騑怀》、《立言》、《秋思》诸集；

1637—1639 年（31—33 岁），作诗不过半百，附于《秋思》之末；

1640 年（34 岁），作《出谷》；

1641—1644 年（35—38 岁），作《闽辞》；



1645—1648 年（39—42 岁），作《素得》；

1648—1650 年（42—44 岁），作《复旦》；

1651—1661 年春（45—55 岁），作《海上》、《所思》、《徂东》、《稽古》、《瞻云》、《陋吟》、《巢居》诸集。^[11]

《宛在堂诗集》（六卷），《揭阳县续志》书目有著录，原书今已很难寻其踪迹，饶宗颐先生《郭之奇年谱》小识云：“东京内阁文库犹有其书，而诸夏竟成稀本”。^[12]民初大埔温廷敬选辑之《潮州诗萃》（稿本，现藏汕头市图书馆）选辑郭诗二卷共有二百六十余首，目前能见到的还有收录于府县志中若干首及散见于其他潮州诗选本的若干首。

郭氏的诗，就现在能够见到的来看，大抵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诗作，以酬唱记游为多，也多写旅途风光、山川险阻，总体风格轻清空灵，清隽飘逸；后期诗作，也写山光水色，而较多记事之作，风格沉郁苍凉，幽愤哀思。这与明末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明王朝的兴废有很大关系，前期虽也处于明末，明王朝虽也危机四伏，各地氛尘四起，王朝政治中心也有所动摇，但仍未崩溃。郭氏或读书或赶考或为官或家居或旅途，总还是春风得意，政绩颇佳，不断升迁，故其心境平和，诗风自然清新明丽。后期则京城陷落，根本动摇，崇祯死于煤山，国已破碎，清兵、叛臣、土寇猖獗，家乡遭危、亲人丧命，唐王、桂王等亡命福建、西粤、滇黔、缅甸等地。作为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又深受主恩的臣子，尽管也仍继续升官，然只有艰难维持残局，企望恢复大业，然国事已不可收拾，身心劳瘁孤寂哀痛，诗风自然也就深沉哀伤，苍茫沉郁。

无论前期和后期，吟写性情，抒怀写心，诗笔雍容流畅，抒写汪洋恣肆，是其主要特色。并且郭氏个体性情、心理向往一直难忘山水泉石，难忘隐逸出世，故无论前期后期，诗中都

有这方面思想的流露。然忠君报国，追求对于人主有所贡献，企望国事有所转环，是他诗歌的主调。

纵观前期作品，写旅途自然风光，是郭诗写得最为空灵澄澈的部分。如《鄱阳晓望》：“湖光初照耀，山意转氤氲。望望空明合，水天何处分。”自然清丽。《衢州道中二绝》：“西流一水向东潺，时与征人照晓颜。归路惟多千嶂阻，愁来欲把数峰删。”“云影相从树影亲，近峰如作远峰臣。奇观始信天工巧，谁把丹青挂夕晨。”闲情悠悠，景中有画。《戏拾滩中怪石》：“山琢胎形水识纹，相依碧涧畏离群。无端过客多幽绪，携尔东归伴白云。”物性人性，野趣闲情，甚有韵致。又如《晚泊与山对卧》：

幽溪出素泉，春山留淡薄。落日挂峰头，我舟系其脚。轻烟拂翠微，远雾环阴壑。陵麓势多端，水石何凿凿。碧渚映黄昏，清河互隐跃。高深一钓如，左右双蓬若。仰观星汉联，颇畏天河落。羁心自抑扬，高枕望寥廓。衾抱夜流奔，梦从山鬼谑。愧尔山中云，及此共冥寞。

与山对卧奇观，通过诗人潇洒飘逸的诗笔描绘，幽韵横生，自然朴素。郭诗中此类写自然风光和闲情野趣之作还很多，如《雨后望山上白云》的自然澄洁，飘洒有致；《深睡》的怡然自得，野趣闲情；《雪夜独坐》的明丽清澈，飘逸峻峭；《桐庐舟中夜坐》“峰低山让月，舟小水亲人”的逼真美妙，至朴至真；《夜坐》“冷风和窈出，疏月向窗开。水脉池中活，云根屋上栽”的清幽和谐，怡静安详；还有如《晚泊所见》的“斜照衔峰薄，飞霞拂岫轻。山环千树绿，月泻一湖清。澄淡由宽蓄，空濛自远横。微风天汉过，仍曳彩云生”的空灵澄淡，宁静清幽。还有如《望庐山和苏韵》，其小序云：“庐山真面，相识颇难，苏子瞻入此，如行山阴道上，应



接不暇，诗无多见，而游情山意，却尽于‘他年故人’及‘身在此中’两绝。余以春日溯流，舟中隐约望之，云峰漠漠，许神游耳。然飞光难定，一水遥涵，化迹清深，就索弥隐，神游身游，未知其所获孰多也？”诗云：“相对无缘认岭峰，入看只与白云同。江舟竟日分横侧，真面遥临一水中。”不失为咏庐山之独特角度。同时人徐汧论郭诗有“惟清乃能奇”^[13]之语，看来是深得郭诗三昧的。

写旅途之山川险阻，无论是写风浪，还是险滩、奇岭，均极形象有气势。如《池州阻风》有句曰：“龙螭趋巨壑，蛟鳄舞阴空。”“仰看羲辔落，或恐地维泛。自怜昏与旦，飘摇似转蓬。”长江的大风浪在这龙螭和蛟鳄的一趋一舞之中天昏地暗，东西莫辨，气势自出。描写自然险滩，更是惊险，如“过皂口”的“云向石头生，山从波面立。崱峿破微痕，呀吮留中褶。摆浪出孤蓬，逆行势转涩。”“汹若动我前，方与奔流揖。”“森森百剑芒，左右倾棱解。”那种自然天险，怪石奇势，表现无遗。《下十八滩》的“扁舟千岫里，次第出危难。侧石通微涧，崩流就远峦。春风传鸟语，烟水入渔竿。举目云深处，惊魂薄自宽”。《严州过滩》的“万壑东来转一涡，千峰叠起竞群嵯。水容挟石生雄势，风力扶人杀怒波”等，都是经历险滩的形象描写。

上述这些诗，虽重在写自然风光，也是表现诗人性情及审美功力、表现技巧的重要方面，正如作者《宛在堂诗集·自序》所说：“江山闻见，岁月师资，舟中独对，如长日加益焉。流洄濒溯，遐心眈眈，一吟一咏，不与人事相接。虽才疏阔，鲜达词源，而晴川芳草烟波，使人诗之，性情大可见。”^[14]因此，这些描写自然之作，确实正是见出作者之真性情。因为在其他大部分诗作之中，也都明显地有着登高望远，感物抒怀，流露出向往闲适隐逸的泉石之思，追随庄子的无拘

无束、陶谢之返依自然。如《望春峰积雪漫成》，于旅途中见春峰积雪之素华、之涵洁，联想为官生涯之阗阗、车马、华筵、歌舞，觉得远不如这自然之美妙，因而“空嗟谢子盐，枉费陶公屑。是以静者怀，于兹堪永结。”《纪怀八首》中的《抱玉》所表达的是珍惜直节、洁身自好，并为不可得而痛苦；《幽兰》所表现的是感叹象征污浊势力的芜草太多、太强大，而象征君子自洁的幽兰太少、太弱小，诗人希望它能留“芳气”、存“孤馥”；《机先》则言君子为不被污染应识“机先”，“嘿念先群动”去践行其“悠悠出世怀”；《远游》则是“轻举念时污，远游悲俗迫”，于是想遨游诸仙境求出世之途。这组“咏怀”诗所表现的性情心态，取向是非常明朗，也相当一致的。最典型地表达此种思绪而且写得最为淡薄空灵的，要数《因读谢李过湖之作不觉恍然》一首，试录如下：

李生思羽化，谢客秘精魂。哀哉复千古，此意岂
 难存。而我追前躅，空闻隔世言。眷彼中流照，波月
 正飞翻。举目菁华聚，水天共一痕。颇疑天与月，于
 兹见窟根。轻霞递明灭，银汉稍堪扪。怀新情曷止，
 接要绪弥敦。高深馀物象，今古卸嚣烦。一棹空明
 外，孤留此位尊。今人不古见，古月为今存。此际延
 心赏，千年那可援。

然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即士阶层的所谓隐逸，多是不满足于现实，或自身的才能抱负得不到重视才引发的，孔子的“道不同，则乘槎浮于海”，只是作为一种退路，老、庄虽无为逍遥，然还是个史官和漆吏，与生俱来便追求隐逸生涯，可以说是没有的。郭之奇也不例外，他的心向隐逸只是他性之所近，他实际的行动还完全是正统儒士儒官，追求的也还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正统思想，这方面在他的诗歌中有很充分的反映。《戊辰殿试后述怀二首》云：



怀抱依三策，遭逢此一时。看花从马背，释褐向龙池。事业无穷日，文章有用时。敢云通国体，亦自许先资。

螭头天乐动，洗耳听薰融。日月流初照，风云及远躬。幸无安饱志，时出淡宁衷。马上西山色，朝朝入眼中。

尽管其第二首尚稍留露一点点淡泊矜持，然其志得意满，春风得意，自信十足的意识怀抱，追求事业有成的抱负壮志，无不清晰显露于楮墨间。《虏檄烽传，步谢韶石廉宪约冯尔弢勤王之作》云：“男儿许国意如何，一剑长应十载磨。每见辕驹皆局促，敢同轩鹤共婆娑。浞池此日看冯奋，门限他年喜谢过。单骑自惭难附骥，且从棋墅听清歌。”向往持三尺剑驰骋疆场，报国以建功立业。另有《追和元诚拊髀思颇牧之作》一首，追念同榜刘元诚以儒士请缨，领兵平虏而为国捐躯。念忠怀旧，伤感莫铭，追和其“忠愤激烈”之诗，“以宠其亡”，情真意切，赞其死得其所。“男儿愧手中，安能死岩谷”。其所向往，引为楷模同调的忠君报国行为和意识，慷慨激切。还有《吊吴辉庵》、《过桃山岳武穆庙》等诗，通过真情凭吊怀念古今精忠报国的英雄，为其洒泪，认同其行为，以表达报国尽忠之志。《过管仲三归台》则通过褒管仲、贬拘儒，深赏管仲王佐之才及其著作，间接寄托其思得明主的思想及感慨。《七月十四立秋雨后望月》由三年的家居闲适，愧己之淹流，对月生向阙之思，正可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又如《崩岸》一诗，由崩岸这一自然意象，引发感慨，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所有这些，无不都是其入世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现。

郭氏早期的诗，无论写自然风光，抒己之情怀，除了轻清空灵，表达丰赡而流畅，寄意既含蓄又明朗。其言志抒情，均

本一真字。郭氏为厚积之古今通人，其对诗歌抒情言志之真之正，有独到理解，其《马上集自叙》曾谓：“思远则心劳，抚时则意杳，吊古则神壮，感物则气连，四者积而道乃情。情之所钟，莫能伪也。旷之以见闻，展之以梦寐，致之以山水，配之以友朋，悠之以岁月，五者备而言乃志，志之所之，莫或杂也。天地殊观，古今快事，不有韵人朗之声歌，煜之编简，后死者安得与于斯哉！追尚往者，孰情深而言永，孰志坦而词昌，孰违情而易性，孰惑志而干时，为真为伪，为正为杂，未由庾识者之眸矣。”^[15]

三

郭氏后期，忠君思想不改初衷，由于明王朝本根动摇，郭氏也曾被排挤落职，后虽重新起用，且仍不断升迁，然家国颠沛，跋涉艰难，心境孤寂。其诗作虽仍有清丽之韵致，恣肆之笔调，然哀时感事，便多了苍茫沉郁，悲凉哀伤的基调。其自适其适之怀，忠君爱国之心，苦撑残局企望转环之图，老骥伏枥之志，成仁取义之操，幽怨悱恻之思，均托诸吟咏。《秋斋独对阅张曲江集追和感遇诗》诸作，由于遭谗落职，独对秋斋，其心绪与张九龄遭贬作感遇诗时正相同，故认同其感遇之作而和之，诗中显出进退出处，顺时自适的淡荡胸襟，感遇抒怀，从容而圆和。又如于偏远之马鞍山构栖《感赋》诸作，写避地入静，倚大海之空旷，虽系暂依以半隐，而诗中几已与自然融为一体矣。试录二首：

独有栖霞客，林峦未许迷。寻幽同记忆，选胜自标题。海色依时卷，岩烟手日携。颇疑空阔内，若与素心齐。

微尚难矜己，虚荣独让时。买山聊复尔，浮海亦